

亚洲的多边主义

— Asia's Multilateralism —

◎ 张贵洪 斯瓦兰·辛格 主编

时事出版社



Association of
ASIA SCHOLARS



Association of
ASIA SCHOLARS

亚洲的多边主义

Asia's Multilateralism

张贵洪 斯瓦兰·辛格◎主编

时事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亚洲的多边主义/张贵洪等主编. —北京: 时事出版社, 2012. 8

ISBN 978-7-80232-549-4

I. ①亚… II. ①张… III. ①国际关系—研究—亚洲 IV. ①D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162291 号

出版发行: 时事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巨山村 375 号

邮 编: 100093

发 行 热 线: (010) 82546061 82546062

读者服务部: (010) 61157595

传 真: (010) 82546050

电子邮箱: shishichubanshe@sina. com

网 址: www. shishishe. com

印 刷: 北京百善印刷厂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20.25 字数: 282 千字

2012 年 8 月第 1 版 201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前 言

YA ZHOU DE DUO BIAN ZHU YI

本书是我们以及几位朋友多年来共同兴趣和持久努力的结果。关于亚洲多边主义的争论已持续了十多年，但我们对本项目的计划始于2009年，当时我们讨论后认为，多边主义将成为21世纪泛亚洲认同最强大的力量。我们多年来进行亚洲研究，特别是作为亚洲学者的经历以及到对方机构开展的合作研究，使我们对这一问题产生了共同的兴趣。

我们一致认为，未来任何世界秩序要持久和有效就必须有亚洲的智慧和经验在其中发挥作用，因为不论是国际关系的理论范式还是实际进程，它们的作用和贡献都在不断扩大。

正是基于这种共同的理解和想法，我们开始尝试探索是否能勾勒出一种即使是临时性但具有泛亚洲特征的多边主义框架，因为近年来出版的研究成果对此都有这样一种愿景。

本书所有作者都把多边主义视为也许是更适合亚洲的一种体系，因为亚洲具有多种文明，不同程度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不同的文化和制度，不同的人口、幅员和地理位置，大量殖民后时代交叉的共同体，以及这些亚洲帝国、王国和公国经过长期争夺演变为民族国家后存在的尚未解决的边界问题。

正是基于这种有限的理解和抱负，我们一起向亚洲奖学金基金会申请了后续资助项目，并于2009年5月得到批准。这一项目本身也是亚洲“多边主义”价值的一种佐证，我们每一个人都了解项目其他

人的期待、优势和核心研究领域，因此得以向读者提供或多或少协调的、并希望是有用的研究成果。需要指出的是，所有这些论文都提交给了2010年4月4—5日在上海复旦大学举行的研讨会，并在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我们特别感谢会议主持人和评论人的贡献，他/她们的观点和看法对论文的修改和亚洲的多边主义这一项目的最终完成具有特别重要的价值。

在项目的整个实施过程中，我们两位主编从我们的顾问和朋友那里得到大量的建议和帮助，使我们受益匪浅，他/她们包括王赓武教授、洛德斯·萨尔瓦多（Lourdes Salvador）教授、帕特里夏·乌贝罗（Patricia Uberoi）教授、沈丁立教授、斯里德哈兰（E Sridharan）博士、杜赞奇（Prasenjit Duara）教授和苏德喜·德维尔（Sudhir Devare）大使等等。

但是，如果没有亚洲奖学金基金会（曼谷）、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上海）的慷慨支持和亚洲学者联合会（新德里）同事的大力协助，以及各位作者的合作和贡献，本书是不可能得以面世的。感谢正在复旦大学联合国与国际组织研究中心从事研究和学习的博士后、博士生和硕士生，他/她们把英文论文译成中文，为此付出了辛勤的劳动。复旦大学的几位教授校译了全部译文，我们在此深表谢意。

感谢上海中导投资有限公司为本书出版提供的资助。感谢时事出版社谢琳女士为本书的出版所付出的大量劳动。

最后，如有任何因为我们理解和审阅的偏差而造成的遗漏之处，我们两位主编负有责任。

张贵洪
斯瓦兰·辛格
2012年6月

目 录

YAZHOURUDE DUOBIAOZHUYI

前 言	(1)
导 论	斯瓦兰·辛格 张贵洪 (1)
一、21世纪的多边主义	(2)
二、亚洲的多边主义行动	(4)
三、亚洲的创造性经验	(6)
四、亚洲对理论范式的贡献	(9)
五、各章主要内容	(12)
六、结论	(17)

第一部分 地区安全范式

第一章 安全共同体范式的演变：亚洲的视角	斯瓦兰·辛格 (21)
一、界定安全共同体	(22)
二、安全共同体范式的源起	(25)
三、演变及应用	(26)
四、东盟安全共同体范式	(28)

第二章 东亚安全多边主义与大国	艾琳·巴维拉 (33)
一、东盟的多边主义品牌	(34)

亚洲的多边主义

二、东亚的安全多边主义	(36)
三、大国和多边机制	(39)
四、美国	(41)
五、中国	(47)
六、日本	(51)

第三章 中亚的创新：作为新规范的灵活性

..... 安妮塔·森古普塔	(58)
一、多边主义与地区安全	(60)
二、大国角色及对大国的回应	(61)
三、地区制度建设的努力	(63)
四、与区域外国家接触	(67)
五、哈萨克斯坦的领导作用	(69)
六、亚洲相互协作与建立信任会议	(73)
七、反思多边活动	(75)

第四章 多边主义视角下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研究 徐向阳 (81)

一、气候变化谈判体制的背景	(81)
二、各国在气候变化谈判中的立场和政策	(82)
三、多边主义与 BASIC 集团国家多边协商机制的原则	(87)
四、对后哥本哈根时代国际气候变化谈判的建议	(90)

第五章 印度的“东向”政策及其对亚洲地区

一体化的影响	胡志勇 (95)
一、印度“东向”政策及其战略目标	(95)
二、印度“东向”政策的演变	(99)
三、印度“东向”政策对东南亚地区安全态势的影响	(104)
四、积极应对挑战，努力构建“印度—中国—东盟”	

友好合作关系	(106)
第六章 冷战后印度的亚洲战略评析	张淑兰 (113)
一、战略的存在	(113)
二、战略的实施	(115)
三、特点、效果及走势评析	(120)

第二部分 制度模式演变

第七章 东盟地区论坛模式对南亚多边主义的启示	乌塔拉·萨哈撒拉布蒂 (129)
一、从东盟到东盟地区论坛	(131)
二、东盟地区论坛：起源与发展	(133)
三、南亚与东南亚之比较	(136)
四、东盟地区论坛模式之于南亚	(139)
第八章 从多边主义看印、巴、伊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的战略考量	戴永红 (142)
一、上海合作组织的战略目标调整	(142)
二、各方的战略考量	(144)
三、印、巴、伊成为观察员后的战略影响	(152)
四、上海合作组织的发展前景	(156)

第九章 东亚经济多边主义：中国担当	
“驾驶员”吗？	丽娜·玛瓦 (159)
一、东亚地区合作	(159)
二、东亚峰会	(161)

三、贸易关系的发展	(162)
四、中国是“驱动者”吗?	(165)
五、中国：推动“东盟+3”的进程	(167)
六、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协定的影响	(168)
七、东北亚的问题和行为者	(169)
八、东亚经济共同体构建	(170)
九、中国参与的动力和动态	(173)

第十章 中国的亚洲多边外交：制度模式的

视角	祁怀高 (177)
一、中国的亚洲多边外交：过程与原因	(177)
二、中国亚洲多边外交的制度模式选择	(184)
三、新形势下的中国亚洲多边外交：挑战与应对	(190)

第十一章 规范一致与东盟建设：后苏哈托时期

印尼的伊斯兰教、民主与多元文化	施雪琴 (196)
一、导言	(196)
二、印尼伊斯兰教：文化“混血性”与多样性特征	(201)
三、政治民主化、伊斯兰极端主义与反阿赫默迪亚运动	(204)
四、自由伊斯兰主义与多元文化	(207)

第三部分 亚洲合作治理

第十二章 亚洲的合作与治理：新挑战、新特点、

新探索	祁怀高 贺平 (215)
一、亚洲国际关系的新挑战	(215)
二、亚洲地区合作的新特点	(219)
三、亚洲治理模式的新探索	(224)

第十三章 国际秩序变迁中的中美亚太战略选择	仇华飞	(229)
一、国际关系理论视角下的国际秩序观		(230)
二、国际秩序转变与中美亚太战略		(233)
三、未来亚太秩序构建		(245)
第十四章 可持续发展：开拓 21 世纪东亚地区合作的新领域	杜幼康	(249)
一、东亚地区的可持续发展面临重大挑战		(249)
二、东亚的可持续发展需要地区合作		(253)
三、东亚地区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有着良好合作条件		(256)
四、可持续发展——开拓东亚地区合作的新领域		(258)
第十五章 亚太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	喻常森	(263)
一、亚太地区权力结构的特点		(264)
二、亚太国家对中国崛起的认识		(266)
三、亚太国家对中国崛起的政策选择		(269)
四、中国崛起与未来亚太格局的变化		(273)
参考文献		(278)
主编简介		(306)
作者简历		(308)



导 论

NA ZHOU DE DUOBIANZHUYI

斯瓦兰·辛格 张贵洪

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国际关系争论的重点都是战争、国家安全和核威慑，然而在21世纪，这些主题已逐渐被对21世纪的需要和挑战的本质的探讨所取代。在很大程度上，曾作为大国争夺舞台和牺牲品的亚洲日益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角，学者们已经在谈论21世纪将是亚洲的世纪。如今，气候变化、流行性疾病、跨国人口贩运、犯罪和恐怖主义等新问题似乎已经开始挑战传统的领土国家的神圣不可侵犯，没有哪一个国家，以至唯一尚存的超级大国能仅仅依靠自身的智慧和能力应对这些挑战。也就是说，未来没有任何一个挑战是可以在传统的威斯特伐利亚民族国家框架内得以解决的，这就使得人们把目光逐渐转向了多边主义。

事实上，在21世纪的最初几年里，我们已经看到世界各地经历了多种类型的多边主义，并由此引发了对多边主义范式的大量争论，因为它要成为界定21世纪国家间关系最强有力的机制，尤其是在亚洲发现多边主义是最适合亚洲国际关系的方式后。由于仍处于加强“民族国家”模式的过程中，传统上的多种古代文明和文化现在又有不同的发展水平、领土和人口规模，有不同的意识形态指导其国家建设，而且在努力解决殖民统治遗留下来的交叉的共同体和领土争端，因此这种机制确实是最适合亚洲国家间关系的方式。

但多边主义并不是第一次如此具有吸引力。当代多边主义可以追

溯到 20 世纪 60 年代，它起源于当时亚非国家的非殖民化过程，并被主要理解为这些新参与者——如果不是新的主题——扩大了国际关系的“成员”和“论坛”。由于两个超级大国崛起并从 20 世纪 70 年代早期开始在一个缓和的体系中共处，进而很快发展为一种权力驱动的多边主义，并最终成为由莫斯科和华盛顿支配的两极主义（bi-polarism），所以强调机制和规范建构的多边主义范式在很大程度上仅作为一种表面形式或处于 20 世纪国际关系的边缘。

一、21 世纪的多边主义

21 世纪，多边主义概念新的发展延续了 20 世纪 60 年代多边主义的若干特征。比如，虽然今天多边主义依然主要从其否定性含义来解释，如反对帝国主义、反对任何形式的霸权主义、反对国际关系中的孤立主义，^①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所变化。如新近的争论开始为之提供一种肯定性含义，并努力通过与冷战时的两极主义与冷战后年代的多中心主义（polycentrism）和微边主义（minilateralism）范式来使之演变成为一种更为精确界定的范式。学者们现在甚至进一步把当代多边主义描述为一种更为深入和复杂的综合体，即与孤立主义和霸权不是分离而是协调形成的“一种随时变化的动态关系”。^② 在这种

^① Thomas F. Keating, *Canada and World Order: The Multilateralist Tradition in Canadian Foreign Policy*,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3; also Zhou Enlai, *Afro-Asian Solidarity Against Imperialism: A collection of documents, speeches and press interviews from the visits of Chinese leaders to thirteen African and Asian Countries*,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Press, 1964.

^② Charles Doran, “The two sides of multilateral cooperation”, in I. William Zartman and Saadia Touval (ed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he Extent and Limits of Multilateral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40–41; Amitav Acharya, “Multilateralism, sovereignty and normative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in Edward Newman, Ramesh Thakur, and John Ti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Under Challenge?: Power, International Order and Structural Change*, New Delhi: Academic Foundation, 2009, p. 108.

变化中的复杂情形里，重要的是需强调亚洲及其主要大国的贡献，这是本书的目的，也界定了本书的要求和范围。

首先，我们很欣喜地注意到，曾在 20 世纪 90 年代早期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正是因为这个引起当代多边主义的争论——已经回来支持 21 世纪的多边主义愿景。毫无疑问，历史上美国曾经是多边主义的重要拥护者之一。^① 但美国对多边主义的支持主要是由于其核心国家利益的驱动，而不是因为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规范倡导者的推动。^② 美国对多边主义的支持，主要是为了：(1) 寻求合法性；(2) 分担责任；(3) 维持国际事务的领导权。^③ 因此，美国范式仍与亚洲的视角有很大的差异，尽管所有这些范式有其自身的优点和局限。比如：美国更倾向于“意愿联盟”式的途径，而不是欧洲制度型的多边主义；亚洲则优先采取基于含蓄的政治承诺，而没有法律约束的信任建立和预防性外交。同时，美国坚持治理中的透明度和责任给亚洲一些政权带来了麻烦。

亚洲多边主义经常被拿来与欧洲联盟的实验相比较，以探究欧洲是否有教训可吸取。但亚洲通过多边机制建立规范的经验与欧洲也有很大的差别。无疑，欧洲模式也许更为先进并整合到其国家政策中，本质上更具有法律性、正式和机制化。与之相比，亚洲努力保持更非正式、隐含和基于互信的特点。广泛而言，欧洲深信有前提的规范实

^① G. John Ikenberry, “State power and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merica and the logic of economic and security multilateralism”, in Dimitris Bourantonis, Kostas Ifantis and Panayotis Tsakonas (eds.), *Multilateralism and Security Institutions in an Era of Globalization*,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21.

^② David M. Malone, “A Decade of U. S. Unilateralism?”, in David M. Malone and Yuen Foong Khong (eds.), *Unilateralism & U. 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s*,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 pp. 19—40. 他对克林顿年代“独断的多边主义”(assertive multilateralism) 进行了有趣的阐述。

^③ G. John Ikenberry, “Multilateralism and U. S. Grand Strategy”, in Stewart Patrick and Shepart Forman (eds.), *Multilateralism & U. S. Foreign Policy: Ambivalent Engagement*, Boulder, Colorado: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 2002, pp. 122—123.

施，亚洲则相信基于激励的单边行动和渐进的方法。^① 亚洲的学者认识到欧洲经验的局限性，对具有泛亚含义和亚洲特色的多边经济和安全机制的长期发展抱有希望。

但是，尽管缺乏某种聚合，美国和欧洲大国依然继续与新兴的亚洲视角、范式和机制保持着接触。正是从美国和欧洲范式与亚洲主要区域和次区域（如西亚、中亚、东北亚、东南亚和南亚）构想的协调过程中，我们看到了加强泛亚多边主义范式的机会。由于美国和欧洲大国——后者现在已相对更好地发展了多边机制和范式——曾直接控制过亚洲的部分地区，从而使得这种协调更容易、更有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本书试图考察亚洲不同地区的多边行动与思想及其互相影响，以探究在亚洲地区间实践和范式中是否发展出任何一致性。在其他地区有自身独特优势的同时，我们看到亚洲大陆的东部在开展新的多边主义行动中处于领先，并已被接受成为亚洲多边主义的引导者。

二、亚洲的多边主义行动

经过长期的欧洲殖民统治和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国台湾（1895年）、南库页岛（1905年）、朝鲜（1910年）和中国（1937的）的侵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亚洲以至整个世界来说预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美国的占领很快导致与日本和韩国的军事结盟以及在亚洲各地的一系列军事安排。这些都重复着某种霸权主义，但这一阶段可以看到亚洲在形成自身特点的多边主义中最早的活动。如在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的领导下，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ICWA）于1947年3—4月（印度独立之前）在新德里组织了一次亚

^① Bates Gill, *Challenges to Effective Multilateralism: Comparing Asian and European Experiences*, Stockholm: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08, p. 11.

洲关系会议。1949年1月，这一委员会为印度尼西亚的独立组织了另外一次亚洲会议，有8个亚洲国家出席了会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关于发展一个亚洲关系组织的想法第一次在当时进行了短暂的辩论。^①

1949年1月菲律宾外长卡洛斯·罗慕洛（Carlos Romulo）访问新德里时，详细讨论了拟订太平洋条约的想法。菲律宾随后于1950年4月在碧瑶（Baguio）组织了另一次由六个亚洲主要国家参加的亚洲会议。但当时美国越来越意识到需要遏制共产主义的中国，并积极把亚洲国家纳入其遏制北京的政策中。^② 推动亚洲多边主义的下一个主要活动是由印度尼西亚组织的1955年4月在万隆（Bandung）召开的亚洲会议。正是在这个地方，中国作为一个主要角色参加了会议并随后发展成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领导者之一。当时美国已卷入朝鲜和越南的冲突，并于1954年9月签订了《马尼拉条约》，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但在亚洲内部，1961年马来西亚发起了东南亚联盟（ASA），得到泰国和菲律宾的支持，随后于1967年发展成为东南亚国家联盟（ASEAN）。

当时还有其他一些被忽视的亚洲多边主义的活动，包括1945年3月22日就已经建立的阿拉伯联盟之类的安排。换言之，它早于欧洲关于煤钢联营的设想，甚至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式结束之前。值得指出的是，阿拉伯联盟并不是建立在领土接近而是共同的文化和语言的基础上，并从最初的7个国家发展到22个国家。^③ 与此相似，发展问题和经济合作促使土耳其、伊朗和巴基斯坦于1964年成立了地区

^① Kishore C. Dash, *Regionalism in South Asia: Negotiating Cooperation, Institutional Structures*,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80. 自2009年开始，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与亚洲学者联合会一起恢复了这一亚洲关系会议，每年11月20—21日在新德里就时事性的亚洲主题举办会议。

^② Kent E. Calder and Francis Fukuyama, “Introduction” in Kent E. Calder and Francis Fukuyama (eds.), *East Asian Multilateralism: Prospects for Regional Stability*, Washington DC: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5.

^③ Cris E. Toffolo, *The Arab League*, New York: Chelsea House Books, 2008, pp. 7—9.

发展合作组织。它被视为美国领导的中央条约组织（CENTO）的延伸，并不久发展成为经济合作组织（ECO）。20世纪90年代，随着苏联集团的解体，经济合作组织进一步扩大到10个成员国，包括5个中亚国家、阿塞拜疆和阿富汗。

20世纪80年代中期，7个南亚国家建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SAARC）。从2005年起，邀请阿富汗加入成为第八个成员国和七个国家作为观察员国。较新的进展还包括中亚的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亚信会议，CICA），它由哈萨克斯坦总统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于1992年倡议成立，包括16个亚洲国家，旨在讨论地区安全，并在为促进双边活动而提供多边平台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在中亚，我们还可以看到若干这样的活动，本书有一章就是考察中亚多边主义的经验和前景的。

三、亚洲的创造性经验

毫无疑问，21世纪最初几年已经看到东盟最有创造性的多边活动，尽管最初它被视为与西方军事联盟过于接近，但一直在集中发展与众不同的亚洲方式，并扩展为亚洲最有活力的力量。它已发展出若干新的机制，把亚洲国家和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大国联系在一起。这些机制包括东盟+3（中国、日本、韩国）峰会、东盟+3+1（印度）峰会。而更重要的是1996年建立的东盟地区论坛（ARF）、1995年开始的有48个国家参加的亚欧会议、有21个成员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2005年开始的有16个国家参加的东亚峰会（EAS）。

现在有一种“东盟方式”，它通过强调“共同体建设”（建立泛亚洲的安全、经济和文化共同体）而形成自己的风格，与欧洲和北美经验存在很大的区别。可以说，东盟在引导这种有泛亚烙印的多边主义中已成为领导者。

另一个泛亚多边主义的成功例子是 1996 年建立的上海倡议并于 2001 年更名为上海合作组织 (SCO)。它深深植根于亚洲的传统，并被视为国际安全机制的一种替代范式。它有适度的目标，从最初的 6 个成员国（俄罗斯、中国、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到 2005 年后扩大到 4 个观察员国（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和蒙古）和 2 个对话伙伴国（白俄罗斯和斯里兰卡）。上海合作组织在解决成员国的边界争端和划界方面取得很大的成功。他们随后把重点转向地区和全球问题，协商在资源开发和反恐怖方面采取联合行动。^① 上海合作组织的这种表现和能力引起了西方学者的负面评论，最常见的是：（1）上海合作组织坚持自主性而不让美国加入；（2）这个“崛起中的威权国家俱乐部”旨在把替代范式覆盖到亚洲。^②

第一个旨在建立泛亚多边主义、在整个大陆层面活动的亚洲范围的网络是由 18 个亚洲国家的外长于 2002 年 6 月在泰国成立的亚洲合作对话 (ACD)，其宗旨是扩大对话、整合亚洲现有的区域组织、凝聚亚洲共同的力量和机会。^③ 目前，它有 28 个成员国，在 12 个最优先的领域开展 20 个联合项目。它是目前为止唯一的泛亚论坛，尽管没有涵盖亚洲所有国家，但正如其发起人泰国总理他信·西那瓦 (Thaksin Shinawatra) 一样，并没有获得重视，影响有限，也没能很有效地吸引到外部力量和其他外部大国。从某种程度上说，其有限的成功反映了仅仅用多边主义原则和规范来推动泛亚多边主义范式的形

^① Kai He, *Institutional Balancing in 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and China's rise*, (New York: Routledge, 2009), p. 38.

^② Thomas Ambrosio, “Russia”, Donnacha O’Beaghlaoigh and Abel Polese (eds.), *The Colour Revolutions in the Former Soviet Republics: Successes and Failur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 148; Bohdan S. Sawych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US Foreign Policy, in Robert J. Pauly Jr (ed.), *The Ashgate Research Companion to US Foreign Policy*, Surrey, UK: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0, p. 79.

^③ M. A. Chaudhary and Gautam Chaudhary, *Global Encyclopaedia of Political Geography*, New Delhi: Global Vision Publishing House, 2009, pp. 18–19.